

19世纪晚期中国的西方技术掮客*

卢宜宜

(北京思摩公司,北京,100080)

摘 要 通过四个具体的例子,该文力图探讨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哪些人在 19世纪下半叶充当着中国引进西方技术的掮客(中间人)这一角色;二是他们的成功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文中所考察的几个例子表明,在当时,对技术问题的精通并非在这一行当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对于掮客们来说,最不可缺少的个人条件是外交技巧和平衡多种不同利益的能力。这些例子还表明,在开始时并不存在纯粹的掮客,那些从事这项活动的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同时扮演其它一些角色。

关键词 日意格,马格里,容闳,德璀琳,洋务运动

中图法分类号 N09

19世纪下半叶中国引进西方技术的过程可以说有三类人的直接参与。在最上层是清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即洋务运动的领袖,其中最有名的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这些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的军事功绩而获得高位的功臣在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时候都已成为管理着几个省的广大地域并控制着大量军队的总督。他们率先引进西方技术并建立中国最早的现代企业——主要是一些军工厂和造船厂——是毫不奇怪的。这是因为,与太平天国作战期间对西方枪炮和蒸汽战船的第一手接触使这些人对中国改进武器装备的迫切需要有着最深刻的体会。此外,他们有足够的影響力并掌握着足够的资源来进行这些尝试。

第二类对西方技术的引进作出了直接贡献的人是那些实际建起中国最早的西式生产车间,操作着第一批现代机械,制造出第一批工业产品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这一类人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虽然外国人的数量相对较少,但他们在初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既承担技术性最强的工作又负责指导缺乏经验的中国工人。

在上述两类人之外还有一些在中间层次上发挥作用的人,他们往往同时承担着顾问、设计师、信息员、采购员、经理等多种角色,似乎无所不为。他们起着把原本分离的各种因素,如西方的卖主,中国的买主,西方的师傅,中国的徒弟,最高层的领导者,第一线的工人等等联结起来的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些人的存在,各种洋务企业才建立了起来,引进西方技术的工作也才得以持续进行。

收到文稿日期:1996年 7月 20日

* 本文是作者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时撰写的,原为英文。论文的指导教师是席文(Nathan Sivin)教授。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这最后一类人便是本文的中心人物。显然,他们从事的绝非是轻松的工作。下面的内容清楚地表明,只有那些具备了一些特殊的背景,才能雄心和机遇的人,才可能充当中国引进西方技术的中间人。这里通过四个具体的例子,正是要探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这一特殊历史环境对这些人物提出的要求

1 日意格

日意格(Prosper Giquel, 1835- 1886)于1857年作为英法联军的一员来到中国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他毕业于法国海军学院,当时是海军中的一名尉官。英法联军于1858年1月占领了广州,随后他们组成了一个三方委员会来负责广州的日常管理。日意格被指派为委员会法方代表的助手,并担任这一职务直至1861年10月英法联军最后撤出广州。这一期间,日意格学习了中文,并积累了与中国人和英国人打交道的很多经验。当英法联军最后撤离时,日意格希望继续留在中国,而且很快就有了这种机会——作为一个既懂中文又懂英文的法国人,他得到了清帝国的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提供的一份工作

清帝国的海关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机构。尽管它隶属于清政府,却从一开始就由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控制。它主要的雇员也由这些人来充当。海关中的西方人虽然是清政府的雇员,中国却并非他们效忠的第一对象。作为西方人,他们在中国享有特殊地位,此外,随着海关迅速成为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他们的服务对清政府来说也很快变得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语言和事务的熟悉又使他们成了其本国政府的宝贵财富。因而,海关的许多西方雇员都在19世纪中西方关系的发展中得以发挥了很大影响,通常是作为顾问、谈判代表、或调解人。

日意格向法国海军请假以便加入中国海关。他提出希望继续学习中文,还特别指出了在英国人控制的海关中有法国的代表会带来的好处。很快,他就获得了3年的长假。

日意格曾写到:李泰国叮嘱他手下的税务司们要设法赢得中国当局的感谢并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以便有朝一日能在中国做大事情。“他(李泰国)对我说中国需要外国人帮助它从目前这种无组织的状态中摆脱出来。我们这些人便肩负着向它提供这种帮助的责任。但是,由于我们才刚起头,我们必须至少在官方上维持我们的海关税务司的身份。”^[1]显然,李泰国的指示与日意格自己的雄心十分吻合,而时代也给予了日意格充分的机会来使他的服务获得中法双方的赏识。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积极参加当时中国的内战。

虽然西方列强在清朝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宣布中立,但它们确信清政府继续执政更符合其利益。经过一些试验,它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既可以帮助清政府又不必投入正规军队的办法,这就是鼓励中外混合的雇佣军发挥作用。最有名的一支雇佣军就是以上海为基地的“常胜军”,它是由西方军官训练中国志愿兵,给他们配备西方武器,再率领他们作战,有关费用则由当地的中国官绅和商人支付。它的任务是保卫上海及其周围地区不被太平军占领。日意格在1862年的春天就与常胜军和一支中法混合炮兵小队一起参加了在上海周围的战斗。他本来是被李泰国派在宁波海关,但他刚到任不久宁波就被太平军占领了。于是日意格关闭了海关,并于1861年12月前往上海。一到上海,他就作为法国驻东亚海军的高级指挥官卜罗德(Pro têt)中将的非正式助手参与了各种军事行动,利用他通晓中

文和英文的优势帮助卜罗德中将协调法军与英军和雇佣军的联合行动

1862年 5月,随着清政府重新夺回宁波,日意格也回到了那里,重开了海关,并迅速着手在宁波组建一支类似于常胜军的中法混合雇佣军。为实现他的计划,日意格做了各种努力以赢得法国当局与当地中国官员的支持。

大概是由于他到中国后的丰富经历,此时的日意格已称得上是中西方关系这一复杂游戏中的好手。在他随后的整个生涯中,日意格始终努力创造和维护与中法双方政府的良好关系,设法使它们对他的工作产生兴趣,并竭力赢得它们的信任。有时,他会利用其中一方的支持来对付他在另一方碰到的麻烦,但他始终有一种明确的认识,即与双方的联系都同样关键,而且与一方的牢固联系只会提高他在另一方眼中的价值。

在日意格组建宁波的中法混合雇佣军,即后来被称为“常捷军”的部队之初,他碰到的主要困难来自中国方面。清政府迟迟不肯授权法国军官指挥这支部队,浙江巡抚左宗棠最初也对一支由外国人统领的部队疑虑重重。左宗棠不仅限制常捷军的扩大,而且在 1863年的夏天还曾下令它减编。在这些困难时刻,日意格与法国在中国的海军指挥部及外交代表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强调常捷军对法国的战略意义,要求他们替常捷军向清政府交涉。

日意格为自己争取支持的才能在他关于常捷军的几篇文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共写过三个关于常捷军的介绍,分别对建立它的动机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在第一个介绍中,日意格将李泰国关于扩大海关影响和赢得清朝感激的指示作为常捷军建立的背景,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样的情节引不起他同胞的兴趣。于是,在另一份献给拿破仑三世的报告中,日意格便强调常捷军能为法国带来的各种好处。他不仅罗列了政治、商业、以及军事上的利益,甚至还举出了情报方面的重要性:“好处之一是我们将得以在这些省份的心脏地带安插一些情报人员。由于他们处于了解中国事务的有利地位,因而将能在特定的时候提供有用的情报。”^[2]日意格还明确提到英国通过像李泰国这样的顾问来扩大它在中国的影响,并希望法国也能采取类似的策略。最后,在关于常捷军之源起的第三个介绍——发表在《两个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杂志上,以法国的一般公众为对象的一篇文章中,日意格又大谈法国和英国在中国的竞争,强调保护住在宁波的法国商人和传教士之安全的必要性,等等。

不久,日意格便显示出他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本领也同样高明。尽管左宗棠没有完全放松警惕,但他终于承认了常捷军的重要贡献。显然,它的西方火炮对于攻破太平军的防御极其有效。左宗棠从 1863年 9月起开始和常捷军密切合作,直至 1864年 10月常捷军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最后失败而解散。这一期间日意格与左宗棠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左宗棠在这一时期以及以后的各种奏折和书信中凡提到日意格总是加以赞扬。日意格与常捷军的另一位指挥官,同样也是法国海军军官的德克碑(Paul d'Aigüebelle)似乎是仅有的两个与左宗棠建立起了密切关系的外国人。从左宗棠的奏折和书信中可以明显看出日意格和德克碑之所以成功主要在于他们态度谦和并愿意承认他们的中国雇主的权威,这与当时的绝大多数西方人的举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左宗棠形容日意格与德克碑在所有外国军官中“最为恭顺”。在一封书信中他还把常捷军的成功归功于它的这两位首领,称赞他们诚实、坦率,愿意听从劝说,并且能与中国官员通力合作^[3]。

事实证明左宗棠的信任极为重要。两年之内德克碑和日意格就是靠着它赢得了建立和领导中国的第一个现代机器造船厂——福州船政局——以及它附属的水师学堂的合

同。左宗棠的信任和支持还帮助日意格度过了在创立福州船厂之初碰到的难关。不过,这次的难关却是由他的法国同胞给他设置的。

法国驻华总领事和公使都反对法国在福州项目中有任何具官方背景的介入。他们认为福州船厂只是一个省级的地方项目,没有很好的计划,极可能失败,因而使法国丢脸。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法国公使甚至建议日意格和德克碑应该退出法国海军。外交部充分支持这一观点。海军虽然没有持如此尖锐的反对态度,但也对福州项目表示了严重的怀疑。

事情由于福州海关的法国税务司美里登(Eugene-Herman de Meritens)插手争夺对船厂的控制而变得更为复杂。海关的总税务司,李泰国的继任者赫德(Robert Hart)曾想将福州船厂置于海关的管理之下,但被左宗棠拒绝了,日意格也因而不得不辞去了在海关的职务。现在,美里登声称获得了赫德的支持,并向清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4],攻击日意格和德克碑为船厂进行的设计。美里登指控日意格和德克碑为了获得建造船厂的合同而给了左宗棠错误的信息并故意对这一项目的难度轻描淡写。他随后将自己描述为真正关心中国的利益并急于为此作出贡献。他还进一步声称法国政府希望他,而不是日意格和德克碑来领导福州船厂。

虽然日意格又利用他的老策略,即强调他的工作对促进法国在中国之利益的重要性来说服法国当局听取他的申诉,但直到左宗棠及清政府出面支持他,法国官方才最终同意日意格继续负责福州项目,同时保留他在海军中的位置。左宗棠的一位主要幕僚拜访了法国公使,表示中国希望从法国得到帮助来遏制英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左宗棠还派人调查美里登的确切身份。中国官员要求法方证实美里登关于获得法国政府支持的话是否属实。最后,法国方面终于确信福州船厂是受到朝廷重视的国家项目,而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官员个人定的项目,并决定不再阻碍日意格的工作。法国公使正式通知清廷,美里登完全是擅自行事,并且希望他不要再介入福州船厂的事务。

左宗棠选择了日意格为福州船厂的正监督。尽管德克碑对船厂的最初筹划作出了更大的贡献,他却只当上了副监督。德克碑在1864年9月,即常捷军尚未解散的时候就已开始为左宗棠制订有关船厂的计划,而日意格直到至少五个月后才开始积极参与其事。日意格被选中担任正职似乎主要是由于他的中文出色^[5]。左宗棠与德克碑的合作因为后者不通中文而曾经有过麻烦,这一经历突出地显示出了保证双方交流通畅的重要性。

后来事情的发展似乎证明了左宗棠所作选择的正确性。虽然他们两人都十分“恭顺”,但日意格在这方面好像愿意比德克碑走得更远。这不免使人揣测,如果德克碑当初担任了正监督,他们与船厂的中方官员的合作可能就不会那么顺利。德克碑和日意格不久就开始了矛盾,德克碑对日意格产生了种种不满,其中之一是他认为日意格对中方官员过于屈从。据德克碑的描述:

“船厂的内部管理完全听命于中国人,而他们用一个比一个更莫名其妙的借口肆意行事。他们的自负达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在我到达船厂时一个中国官员对我说:‘日意格先生对我们提出的任何事情都表示赞同。如果我们总是正确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欧洲人来当监督?’”^[6]

德克碑与日意格的矛盾导致他于1870年3月离开了福州船厂,日意格则继续担任监督至1874年2月合同期满为止。在他负责的7年中,一座现代的造船厂从无到有,15艘蒸汽船也在其中建成。更重要的是,船厂附设的学堂培养出了一批工程师、机械师、导航

员、船长等各种人才,他们都属中国最早的海军专业人员之列。清朝方面的主管官员在上奏朝廷的报告中认为合同的各项条款都得到了圆满履行,并对日意格的工作大加称赞。日意格受到了清廷的优厚封赏,除了大量金钱的赏赐,还被授予“顶戴”、“宝星”,并获得了清朝的最高一级军事奖赏——赐穿黄马褂^[7]。

离开福州船厂之后日意格仍保持着与洋务运动的联系。他率领了一批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赴英法留学,他还曾是李鸿章在欧洲的采购代理之一。1880年,日意格与马格里(下文将介绍)一起陪同清朝驻英国和法国公使曾纪泽出使俄国。在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日意格同时是双方政府的非正式顾问。他于1886年2月去世,当时他仍担任着中国留学生的监督,并正在等候最新的一批中国留学生抵达欧洲。

2 马格里

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 1883—1906)是苏格兰人,曾就读于爱丁堡大学。1858年他从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后加入了英国军队,成为一名军医。1860年初,他所在的部队被调到中国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

马格里的部队先是参加了占领北京的北征行动,之后又前往广州驻防。像当时也在广州的日意格一样,马格里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中文。1862年2月,他随两个连一起被派到上海帮助阻击太平军。当时,虽然马格里的中文还不流利,但已可进行一般的交谈,这使他能够结识了一些中国官员和士绅。马格里在上海结交的朋友中有一位名叫杨坊的买办商人,该人是常胜军的主要筹款人。他邀请马格里来为清朝工作。

此时,雄心勃勃的马格里已经意识到军医生涯不可能为他带来远大前程,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另寻捷径。因此,中国方面的邀请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但直到认识了当时在江苏指挥对太平军作战的李鸿章,并由李鸿章许以常胜军统领白齐文(Henry Burgevine)的军事秘书之职后,马格里才下定决心脱离英国军队来为清朝效力。马格里的传记作者鲍尔杰在谈及马格里的这一决定时写道:“他绝非草率地迈出了这一步。他仔细考虑了他在英国军队中的位置,它可能提供的机会以及它的局限性,最后他冷静而勇敢地作出了决定:在中国军队中他将获得更符合他的志趣并更有前途的生涯。……他的举动证明了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的那句格言:冒险仍然属于有冒险精神的人。”^[8]

一旦决定了把赌注押在为中国的效力上,马格里便努力给他的中国雇主留下好印象。在这一点上他似乎十分成功。马格里加入常胜军后几个月,白齐文因故被撤职。驻上海的英军指挥官斯代伏利(Staveley)已有了中意的人选代替白齐文,而中方官员却更想让马格里统领常胜军。据鲍尔杰的描述:“中国人倾向于马格里是因为他能讲中文,与他们打交道时谦恭有礼并且愿意作出妥协。毫无疑问,如果斯代伏利将军当时赞同而不是反对对马格里的任命,他也肯定会接受这一职务。”^[9]实际情况是,由于斯代伏利的反对,一位英国军官戈登上尉成了白齐文的继任者。

虽然名义上是在常胜军效力,实际上马格里不久就成了李鸿章的私人助手。当他看到李鸿章花大价钱购买西方的弹药,便向李鸿章提出他应该自己制造这些弹药。这一建议使得马格里后来在中国的生涯与中国建立现代军火工业的努力连结了起来。

李鸿章采纳了马格里的建议并要他负责这一工作,于是马格里在上海附近的松江建

起了一个车间。关于他是如何从零开始的马格里自己留下了一段有意思的记述:

“获准离开英国军队后我加入了李鸿章的部属。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向他指出他为弹药付出的价钱何其过分,以及如果他着手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即重新装备他统帅下的军队,将需要为购买弹药拿出的庞大数目。为买一发从英国炮舰上偷来的12磅重的普通炮弹就要花30两银子,而10000个质量低劣的雷管要价竟达19两银子,或6英镑。我向他指出欧洲国家有大规模的设施来制造这些东西,而中国如果真正了解她自身的利益所在就应该也拥有自己的这类设施。李鸿章充分认识到了我这一提议的意义,但他担心靠中国的劳动力无法做到这些。我便设法向他表明这是可以做到的,并且过了一阵子后做出了一发炮弹,一些引信,以及摩擦管。在为这些新的设施播下种子的同时我又负责了两团步兵及一连炮兵。当英国将军斯代伏利下一次来参观的时候,李鸿章在事先未告诉他来源的情况下把它们陈列在他面前并询问他的意见。这些意见非常积极而肯定,以至于李鸿章立刻授命我雇五十名工人并在旁边的一座庙里开始工作。

一切都是在没有一台机械,一个铁炉,或者更确切地说除了一把锤子和一个锉刀之外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开始的。我们用附近地里的泥土拼凑出了一个熔化装置。等到造出的火炮有了足够的水准并且准备了足够的弹药后,我邀请道台来观看打靶练习。它的效果如此之好,以至于不久之后我就被要求上阵。我照办了,并且在一支当地部队的协助下成功地攻下了芳泾(音)和泗东(音)镇。”^[10]

1863年12月,李鸿章从太平军手中夺回了苏州,他随即命马格里把他的小军工厂移到那里去。在苏州,通过马格里的努力,军工厂添置了一些先进的设备,从而面貌一新。搬迁还在进行中的时候,马格里获悉有一套欧洲的军工机器被运到了中国,但是,由于一些变故,它的货主可能又要把它运回去。于是,马格里马上建议李鸿章把这套机器买了下来。事后,李鸿章似乎一度对这一决定是否明智产生了怀疑。关于马格里是如何说服李鸿章的,鲍尔杰留下了一段有趣的记录:

“当李鸿章看到躺在地上的一箱箱一块块的铁件和钢件,他冷笑着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钱被白扔掉了。马格里请他耐心等一阵子,在有人去请他之前先不要再来。他随即动手把车间组装了起来。一切弄停当之后,他请巡抚(李鸿章)来为军工厂剪彩。他事先向手下人布置好了,只等他一打铃就把所有的机器一起开动起来。李鸿章进门之后,马格里先给了他足够的时间观看静默无声的车间,然后他给出了信号。一瞬间所有的机器同时运转了起来。李鸿章对此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并且这件事情无疑大大提高了马格里在他眼中的声望。”^[11]

1865年,李鸿章被任命署理两江总督后把总部移到了南京,马格里和军工厂也再次跟着他搬了家。然而李鸿章并没有在南京呆多久,第二年他就被调到北方去镇压捻军起义。离开之前李鸿章任命马格里和南京的首席官员在他不在的期间共同负责所有与外国的交涉。这一任命大概可以说是马格里作为李鸿章的幕僚生涯的顶点。马格里将这一使命担任了6个月,直至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

与此同时,马格里继续领导着他的越来越繁荣的军工厂,此时它已被重新命名为金陵机器制造局。他在南京安顿了下来,靠清朝给予他的慷慨报酬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他有一支30人的私人卫队,所需的费用全由清政府支付。马格里与曾国藩的关系也很好,特别

是在他成功地替曾国藩夫人治过一回病之后,同时,马格里也积极地与他的欧洲同胞们交朋友。他有很大的一圈西方朋友,并且经常在家里款待客人。从马格里的往来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帮助本国同胞尤其热心。他为英国在华的代表们就如何与曾国藩打交道出谋划策,还替一位尊贵的朋友,英国海军的凯佩尔将军收集中国古董,使后者大为高兴。

经营一座军工厂并非易事,但马格里似乎应付得很好,他无疑是个精明的经理。机器局的供货商们发现马格里不好骗,他手下的雇员,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也都发现不好好干活就过不了关。但是,让马格里花费最多精力的大概还是跟踪西方军工业的最新发展并不断拿出新的、更复杂的产品。马格里的一个朋友曾经写道:

“在制造现代枪械方面,马格里一直因为缺乏掌握技术的外国工头和专业书籍而头痛。他经常提到他为获取信息而作的种种努力,因为一旦他在专业问题上表现出无知将对他的地位造成致命的后果。中国人至少在好几年的时间里都以为军工厂造出的所有东西都是马格里自己的发明!这大大增加了他的威望。”^[12]

李鸿章后来再也没有回南京,这意味着马格里与他密切的私人联系在1866年10月之后便中断了。李鸿章离开南京不久,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办的主要的一份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在评论清朝官员好干涉外国顾问的工作时写道:“如果当时在马格里和李鸿章之间还夹着一位清朝官员的话,这位总督如此依赖的军工厂现在就根本不会存在。”^[13]不论这一说法是否正确,李鸿章走后马格里确实与和他共同主持金陵制造局的一位姓刘的官员矛盾不断。这位官员寄给李鸿章的尽是批评马格里的报告,而在回答李鸿章的质询时马格里则将制造局的问题归咎于这位刘大人和他的朋友们干涉他的工作,使他无法管理工人。这两人的争斗最后发展到马格里在1873年要求李鸿章要么把刘大人调走,要么把他调走。

李鸿章满足了马格里的愿望,调走了刘氏,但马格里与刘氏的继任者的关系甚至更糟。李鸿章对马格里也不那么支持了。1874年6月,马格里在欧洲进行了七个月的考察休假并为制造局订了一些新设备后回到中国,随即便被召到天津向李鸿章作汇报。李鸿章给了他很冷淡的接待。马格里发现他的那位清朝同僚也在那里,而且在李鸿章接见他时马格里觉察出他藏在里间听他们的谈话。1874年的8月里,马格里一直忙着为对他的指控写申辩。李鸿章对制造局的好几桩事情都十分不满,但最主要的是他在给马格里的一份公函中提出的一点。他质问马格里,如果他真心让制造局的外国雇员指导中国工人,那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中国工人仍然要依赖外国人^[14]。到了11月,马格里的申辩说服不了李鸿章已经很明显了,因为李鸿章另外任命了一个清朝官员,令他同原先已在那位官员一起担任制造局的主管,而将马格里降职为外籍指导。

马格里马上交出辞呈以示抗议。1875年1月,他的辞呈尚未得到李鸿章答复的时候,大沽炮台的两门由金陵制造局制造的大炮在操练时爆炸,炸死了几名士兵。事后的调查发现炮是用劣质钢铁铸造的,而这一做法曾得到马格里的批准。马格里承认他犯了“判断上的错误”,但除此之外不肯承担更多的责任。李鸿章建议他按照清朝的惯例自己上书朝廷请求处罚,被马格里拒绝了。5个星期之后,李鸿章解除了马格里在金陵制造局的职务。

李鸿章并没有抛下马格里不管。虽然他的未来一度显出不太确定,但不久就有好消息上门了。清政府其时正要派郭嵩焘作为首任驻英公使赴英国,李鸿章便推荐了马格里担任郭嵩焘的英文秘书。马格里随郭嵩焘于1876年离开中国。此后的30年里,他一直在伦敦

的中国公使馆占据着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位置。1885年他受封为爵士。1905年底,马格里从中国公使馆退休,6个月后他在苏格兰去世。

3 容闳

容闳(1828—1912)是广东省香山县人。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广东自19世纪初起就成为西方影响渗入中国的门户和重要堡垒。在容闳小时候,他的父母把他送入教会学校接受西方教育。1847年,容闳的老师之一,一位名叫塞缪尔·布朗的美国传教士回国时把他也带回了美国。容闳后来进了耶鲁大学并于1854年毕业,因而成为第一个获得美国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虽然容闳入了美国籍,但他的理想却是为中国作出“巨大的贡献”,他尤其希望帮助更多的中国人接受西方教育。在自传中容闳写道:“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结束之前我已经计划好了我要做的事情。我坚信新一代的中国人应该享受我曾享受过的那种教育的好处,并且通过西式教育中国或许会获得新生,变得文明而强大。实现这一目标成了我的一切雄心的指南。”^[15]容闳于1855年回到中国,这之后的10年中,他便一直不懈地寻找着为中国效力的机会。

容闳回国后试了好几份工作,但其中没有一个使他满意。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美国驻华公使伯驾(Peter Parker)的私人秘书,但不久就辞了职:“……我本以为跟他在一起我或许能接触到一些中国官员,但事实远非如此。我看到自己既不能从他那儿学到任何东西,又无法扩大与中国官员的交往,便放弃了这一位置……。”^[16]容闳后来到了上海,并先在海关找到一个职位,但他发现他的同事们都惯于受贿,而且作为中国人他根本不可能指望有朝一日升为税务司。于是,他很快又辞了职。

这之后容闳曾在一家英国商行短期工作,又替另一个洋行采购过茶叶。在这两个差事之间他从事了一些翻译工作,并对这项活动很满意:“这一自由副业虽然赚不了什么钱,却使我认识了更多士绅阶层的中国人,而扩大交游是我主要关心的事情。”^[17]

这一时期发生的几件事使容闳出了名。先是他与一个苏格兰人在一处公共场合打了一架。这位被容闳形容为“六英尺高的健壮大汉”的苏格兰人侮辱了容闳,并在容闳要他道歉时反打了容闳一拳,而容闳立即给了他一记更有效的回击。这一事件据容闳的描述“在一个短时期内成了外国人之间谈论的主要话题,而在中国人中我则受到极大的尊敬,因为自从外国租界在治外法权的基础上在上海建立起来后,在租界内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当他的权利被一个外国人践踏和侵犯时敢于断然起来捍卫这些权利。”^[18]

继而发生的两件事进一步提高了容闳在中国同胞中的声望。当地一位有名的商人去世后,容闳和一个英国人同时受聘把他的墓志铭翻成英文,而容闳的译稿被采用了。随后,一些头面士绅请容闳起草一份通告,向上海的外国居民募捐来赈济中国灾民。通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一周之内便筹到了一笔不小的数目。经过这两件事,容闳的名字在上海的士绅中间变得广为人知:“这次不是作为一个斗士,而是作为一个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学生。”^[19]

容闳结交能够帮助他实现理想的朋友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收获。1863年,通过他在上海结识的李善兰、张斯贵、华蘅芳、以及徐寿的推荐,他被曾国藩召到南京。曾国藩正在

物色派到国外为筹建中的一个机器工厂购买机器的人选,容闳那些正在替曾国藩翻译西方科学书籍并试验蒸汽船的朋友们便推荐了他,因为他不仅熟悉西方的语言和事务,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曾通过在上海的一些行为证明自己是一个真诚希望为祖国效力的可靠的人。

据说曾国藩接见容闳时一开始便问他是否能在自己手下担任一名军官。容闳回答说因为他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又缺乏这种经验,恐怕难以胜任。曾国藩“对这一回答极为高兴。‘这是一个诚实的人,’他说道:‘一百个人里有九十九个被我召来问这句话时都会马上回答‘是’,以便谋得差使,不论他们有无能力。但这一个却是对自己的能力有恰当估计的人,并且懂得谦逊。’”^[20]

两周后曾国藩再次召见了容闳。在这期间容闳已从他的朋友们那里得知了总督大人召他来的目的。于是,当曾国藩问他,在他看来当前中国最需要做什么事情,虽然容闳极想提出他心爱的派遣留学生去西方学习的计划,但他还是明智地给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建机器工厂的答复。不过,容闳说服了曾国藩和他的友人,当前中国应该购置的是通用的而不是专门化的机器:

“我告诉他们应该要一个可以复制出与自己一样的机器工厂的机器工厂;这些机器工厂然后再可以制造出专门的机器来生产专门的东西……我特别提到步枪的生产:为造出它的部件需要不同的机器,但我推荐的那种机器工厂不是专用来造步枪的,而是可以造出再去制造步枪、大炮、子弹、或其它任何东西的专门机器。”^[21]

第二次接见后不久,曾国藩就授权容闳到国外去购买机器。曾国藩感到自己缺乏决定哪种机器最合适而必需的知识,因此他给了容闳很大的自由,包括由他决定从哪国定货。

毫不奇怪地,容闳去了美国,并从马萨诸塞州的普特南机械公司购得了机器。一年后,容闳顺利完成使命归国,经曾国藩举荐,他被授予五品候补同知之衔。容闳买回的机器构成了著名的江南制造局的一个主要部分。在他的新位置上,容闳与时任上海道台,不久后又升为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成了好友。丁日昌^①与曾国藩和李鸿章关系都很密切,并且以具有“进步倾向”而知名。一刻也未忘怀他的留学生计划的容闳向丁日昌提出了这一设想,并立即获得了丁日昌的热心支持。丁日昌请容闳把他的想法写成书面建议,并答应替他將建议送到北京,呈给洋务派的首领之一——文祥。

容闳共拟了四条建议。除了选派留学生,他还建议清政府组织轮船公司,开采矿山,以及限制外国传教士的特权。容闳聘请的一位就“中国官场的作法”给他当顾问的师爷让他把留学计划列为第二条:

“这四项建议中的一、三、四条都是为第二条作陪衬的,它才是我全心全意想着的,而且最希望被采纳的计划;但是,我的中国老师建议不要把它放在太显著的位置,这样它才被安排在第二位。”^[22]

不巧的是文祥刚因丁忧而卸了职。容闳不得不又等了3年才找到机会通过丁日昌將他的建议呈上曾国藩。曾国藩将它们上奏朝廷,并得到了批准。清政府决定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容闳被任命为率领这批留学生的两名监督之一。

留学的筹备工作于1871年开始。1872年,第一批学生启程赴美,容闳也随他们一起

① 关于丁日昌的事迹可参见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出版,由吕实强所著的《丁日昌与自强运动》。

又回到了他入籍的国家。从 1872年到 1878年,他的主要职责是监督留学生的教育,但容闳也完成了一些其它的重要任务。据容闳的自传,他说服加特林公司给了他加特林机枪在中国的独家代理权,而且很快就替他们从天津弄来了 50挺机枪的订单,总价值超过 10万美元,此后该公司还继续收到了更多的订单。用容闳自己的话说:“我迫切希望中国不仅能拥有受过最现代化教育的人才,而且能拥有最现代化的武器。”^[23]据其它的资料,容闳还不断向李鸿章推荐了一些别的美国军工产品,比如 1874年他曾传给李鸿章关于铁甲战船的信息,另一次,他还向李鸿章推荐过一种水雷^[24]。

从 1878年至 1881年,容闳的主要任务转为担任中国驻美的副公使。1881年,令容闳深为失望的是,清政府决定取消留学生计划并召回所有的学生,尽管他们尚未完成学业。容闳于同年随学生们一起回国。他与曾国藩 1871年去世后成为他的新保护人的李鸿章见了面,又去了北京。容闳很可能想设法挽救留学生计划,或至少是它的一部分,可惜没有成功。虽然他依附李鸿章有一段时间了,但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从未达到密切的程度。容闳很可能认为李鸿章面对顽固派的攻击没有全心全意地维护留学生计划,而李鸿章则说多年来留学生的中国文化教育被忽视,这招致了众多的指责。他曾一再就此提醒容闳,但容闳却不注意他的警告^[25]。

由于找不到值得干的新工作,容闳于 1883年春返回了美国。此后的 12年中他与家人在康涅狄格州过着平静的生活。1894年爆发的中日战争使容闳再次出面向洋务运动新起的领袖张之洞提出了两项建议。张之洞决定采纳其中之一,并请容闳负责实施。这意味着容闳要赴英国向西方国家商贷一笔款以帮助中国加强防卫,抵御日本。容闳完成了他这部分任务,不过,清政府内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些成员反对这一计划,因而它未获成功。

结束了在伦敦的使命后,仍愿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效力的容闳应张之洞之邀回到了中国。“经过这次召见”,容闳写道,“我从李鸿章的人变成了张之洞的人。”^[26]但是,容闳与张之洞的会面没有产生什么结果。两人只见了一次面,彼此似乎都不怎么喜欢对方。容闳觉得他关于中国应聘请更多的外国人来帮它治理国家的建议对张之洞来说大约过于激进了。

容闳在中国又呆了几年,又提出过一些改革方案,但都没有什么结果。他在美国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并于 1912年在那里去世。

4 德瑾琳

关于德瑾琳 (Gustav Detring, 1842—1913)的早期生涯只能找到极有限的资料。现在只知道他 1842年出生于德国于利希,在亚琛上的中学,曾在布鲁塞尔的一家丝绸公司工作。他在那儿碰到的一位“英国顾客”把这位年轻的德国人招募进了清朝的海关^[27]。德瑾琳从 1865年 4月开始在海关工作,并于 1872年升为税务司。1875年他被派到烟台海关。

1876年,李鸿章赴烟台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 (Thomas Wade)就马嘉理案的善后进行谈判。海关的总税务司赫德也作为调解人和李鸿章的顾问到了烟台。除德瑾琳外,赫德还带了另外两名富有经验的海关职员作助手,但只有德瑾琳能够在整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和赫德一起替李鸿章帮了不少忙。赫德发现德瑾琳与所有在那儿的清朝官员都有良好的关系,并且非常善于与参与谈判的每一位重要人物建立起联系:“德瑾琳有一套

设法与官员的朋友和师爷们结识的好计划。通过他们来行动,他确实成了这儿的一股势力。”^[28]赫德自己也从德璀琳的广泛联系中受益不少,获取了关于各种幕后策划和秘密活动的情报。

德璀琳在烟台谈判期间的表现一定给李鸿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年后,德璀琳被调到了天津,也就是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的衙门所在地。从此,李鸿章和德璀琳开始了他们长达二十多年的密切联系。德璀琳被调到天津是否是出于李鸿章的意愿不得而知,但他从 1877年至 1905年一直担任天津海关的税务司,这毫无疑问是靠了李鸿章的影响。赫德在统治他的海关时采用了一种“运动原则”,使他的手下“在二十四个海关口岸不断循环流动”^[29],而德璀琳是唯一一个赫德未能随意调动的人。1879年,赫德在日记中记道:“德璀琳:总督 [李鸿章] 叫我不要调走他。”^[30]1884年,赫德发现德璀琳利用回国休假之便在巴黎和柏林就中法关于越南的争端展开了“业余外交”。赫德大约想通过把德璀琳与李鸿章分开使他不能插手这件事,于是德璀琳一回中国就被调往广州。可是,这位约束不住的德璀琳却设法作为法国海军的莱斯佩 (Lespès) 将军和福禄诺 (Fournier) 上校的客人乘法国的一艘送公文的船前往广州,一路上和他们讨论了解决越南问题的办法。一到广州,德璀琳就将讨论的结果发电报通知了李鸿章。李鸿章马上请总理衙门命赫德把德璀琳调回天津,执行与中法谈判有关的特殊任务。于是,赫德调走德璀琳的尝试便以德璀琳仅在广州呆了一个星期而告终。中法谈判结束后,德璀琳仍回到了他在天津的老位置上。^①

与日意格、马格里、以及容闳不同,德璀琳从未在外领导过具体的“野战行动”(比如日意格的福州船厂,马格里的金陵制造局,以及容闳的留美学生),他一直扮演的都是李鸿章身边的“参谋官和联络官”的角色。德璀琳几乎天天和李鸿章在一起,就随时发生的各种事情向他提出建议。在描述李鸿章的外籍雇员时福色姆写道:

“有两个人——德璀琳和毕德格^②——或多或少地处于塔尖之上。李鸿章幕府中的外国人通常都先将各种通讯转给这两人之一。这并非因为他们被命令这么做,或是李鸿章正式建立了一套从上到下的领导关系,而是因为他们俩都几乎天天和李鸿章密切接触并且能说中文。德璀琳是在李鸿章的商业和工业企业中的外国人,以及协助他处理外交事务的外国人的联络人。毕德格负责海军中的外籍雇员及一般的外国人。另外还有一种基于地域和语言的非正式分工:德璀琳掌握着李鸿章雇的欧洲人,而毕德格则吸引了美国人,有时还有英国人。”^[31]

许多当时的记载都证明德璀琳对李鸿章有很大的影响力,并且拥有他的充分信任。曾于 1887至 1889年间在天津海关德璀琳手下任职的庆丕 (Paul King) 写道:“他 [德璀琳] 与总督 [李鸿章] 都喜欢玩政治。这位天津海关税务司常被召到衙门里去参加‘彻夜’的商谈。”^[32]据庆丕的描述,天津的某位清朝官员常说直隶从上到下的所有官吏都是“老婆子”,因为他们都让这位外国税务司牵着鼻子走^[33]。在赫德 1911年去世后继任总税务司

① 1884年 10月 17日,赫德在给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负责人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我刚刚重新任命德璀琳管理天津海关……德璀琳回天津不是我的愿望,但由于很多原因这是该做的事情……”摘自 John K. Fairbank et al ed., *The I. G. 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Customs 1868-190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tter 499, 572.

② 毕德格 (William N. Pethick) 是美国人,曾任美驻天津副领事及李鸿章的秘书。

的安格联 (Francis Ahlen)曾写道:“……李鸿章的地位是如此令人生畏,以至于德璀琳是唯一敢告诉他中不听的真话的人。”^[34]德璀琳自己把李鸿章比作“一只没有舵的船”,并认为李鸿章在天津时自己便是他的舵^[35]。

德璀琳作为李鸿章的外国顾问为何获得如此成功,这一点不难推测。所有的记载都称他对李鸿章非常忠诚,并且尽管“在很多方面都是个典型的德国人”^[36],却“完全站在中国人一边”^[37]。无疑这些都是李鸿章所欣赏的。另外,如上面已提到的,德璀琳具有到处交朋友和获取各种信息的非凡才能。赫德曾评论到:“德璀琳特别喜欢搞柯克所谓的‘内部外交’,通过与每一位下属拉关系来弄清他们上司的活动。”^[38]……绝大多数人都未曾尝试或根本不愿意象他那么广泛地交结中国人。”^[39]关于德璀琳消息灵能的例证可以从下面英国驻天津的领事给他的上司威妥玛公使的信中找到。这段话写在1880年戈登^①第二次来中国期间:“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戈登上校让我看了你给他的信,他随后写了一个字条给德璀琳并附上了你的信,我对他说我不认为你想让德璀琳看这封信。他说‘噢!德璀琳反正什么事情都知道’,这当然是一点不假的……。”^[40]象这样一个顾问当然会对李鸿章很有用处!

德璀琳拉关系和搞情报的本领无疑如庆丕所说应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他愿意超越那种“德国高于一切”的态度^[41]。例如,多年中德璀琳一直与著名的英国怡和洋行 (Jardine, Matheson & Co. Ltd.) 保持着密切联系。1881年,当怡和正在中国争取一些铁路合同时,它在天津的代理人报告说他确信怡和的任何提议都能在“非常机密并且不走漏一点儿风声给任何德国公司的情况下”通过德璀琳交给李鸿章。这位代理人接着说打算让德璀琳了解怡和的计划的所有细节,以便“最佳时机一出现他就可以把它们推出来。”^[42]在另外一些场合,德璀琳也表现出愿意推动德国以外的利益,如果这对实现他的计划更有利。

德璀琳的这种世界主义风格不可避免地招致了他同胞的攻击。1875-1893年间任德国驻华公使的巴兰德 (Max von Brandt)称德璀琳是个“没有祖国的冒险家”,多年里一直“努力表现出他完全象个中国人”^[43]。虽然巴兰德的后任绅珂 (Schenck zu Schweinsberg)没有批评德璀琳,但他也评价说德璀琳是个喜欢自行其是的具有“独立个性的人”^[44]。绅珂的后继者海靖 (Von Heyking)远不如他的前任那样能容忍德璀琳的“独立”。他对德璀琳的敌意达到了使德璀琳称他为自己最大的敌人的程度。德国驻天津的领事艾斯瓦特 (Eiswaldt)完全赞同海靖的意见,并且尤其反感德璀琳“亲英国”的倾向。

不过,公正地说,德国无疑从德璀琳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中得到了好处。虽然德璀琳不把自己看作是德国利益的代表,但他也绝不会傻到忽视与“祖国”的联系。别的不谈,至少在向中国输入德国的武器,战舰,贷款,还有“专家”方面德璀琳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以至于整个80年代英法的武器出口商每当抱怨德国公司得到了优惠待遇时经常指出德

① 戈登是常胜军最有名的一位统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常胜军解散后,他于1864年离开中国。1880年,当伊犁危机一度似乎要导致中俄之间爆发战争时,经赫德鼓动,他被请回中国。戈登在天津李鸿章那里呆了几个星期,还去了一次北京,不过,最终他的这次中国之行仅作为一次短暂访问而结束。伊犁危机最后也和平解决了。

琳来

中国经德璀琳之手获得的德国进口中包括一位叫汉纳根 (Constantin von Hanneken) 的人,他后来作为李鸿章的军事顾问有过很成功的生涯。汉纳根的父亲是德璀琳家的朋友。1877年,汉纳根因为一次“为了名誉的决斗”而被迫退出了普鲁士军队,他的父亲便请德璀琳替他在中国找份工作。汉纳根学了两年工程学后,德璀琳把他弄到了中国。有意思的是,德璀琳为雇汉纳根提出的理由尽是与汉纳根的父亲而非他本人有关的:他的父亲是普鲁士陆军的一名中将,一位得到肯定的军事科学作家,并且是德璀琳的朋友——这一点在中国雇主看来非常重要。后来,当汉纳根在李鸿章麾下效力时,这位老汉纳根也确实多次替他的儿子出谋划策,证明当年德璀琳的论点不无道理^[46]。

汉纳根作为李鸿章的军事顾问签了 7 年的合同,其中有一条专门规定他不得收受军火商的任何礼物或贿赂,或者自己从事任何商业交易。尽管汉纳根同意了这一条件,但他显然不愿放过利用中国对西方武器的大量需求而牟利的机会。到任刚几个月,他就说动了李鸿章购买普鲁士军队处理掉的一些枪。交易将没有任何中国或德国的中间商参与:汉纳根的父亲利用他在普鲁士军队中的关系直接谈判购买这批枪,然后再由德璀琳的兄弟以中国政府的商业伙伴的名义出面买下它们。从这笔交易中几位参与者将能获得 5% 的酬金,即大约两万两银子^[47]。

不幸,清朝驻德国的公使发回公文说那些枪都无法使用,因此他反对这桩买卖。这之后德璀琳立即发报给汉纳根的父亲,让他取消了这笔交易。这件事似乎丝毫也没有影响汉纳根随后在中国的生涯。李鸿章授命他主持修造旅顺和威海卫两军港的防御工事,他因此而出了一名。1894年,他被任命为北洋舰队的两名提督之一,并以这一身份参与了黄海海战。

再回来说德璀琳。他的中国生涯中一个值得一提的方面是他与顶头上司赫德的关系。这两人的同时代人都津津乐道他们之间的竞争,而德璀琳也确实是清朝的外国雇员中仅有的在影响力上或许能与这位总税务司比一比的人。虽然德璀琳对他们两人之间关系的看法不得而知,赫德倒是在给他在伦敦的代表和亲信的朋友金登干 (James Campbell) 的密信中多次提起这一话题。赫德反复强调只要德璀琳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国他就不会在乎,他自己不是个“占着位置却不干事的人”,并且“这个场所足够一打领袖人物在其中活动”^[48]。尽管如此,赫德还是忍不住抱怨德璀琳的行为。明显地,德璀琳根本不把自己的行动告诉赫德,更不要说请求他的批准了。不仅如此,据赫德说德璀琳还喜欢在他的背后玩儿“小把戏”,而且总是和所有离开赫德的人交朋友^[49]。好多次,当向他的朋友倾诉这些烦心事时连显赫一时的总税务司也不免自怜自叹。比如:“……如果我硬要呆得太久,总有一天会倒霉的……我必须留心这种迹象,无论哪一天你听到我被称为前总税务司都不必吃惊。”^[50]

有时候,赫德甚至表现出嫉妒德璀琳。一次,他写道:“……让我恼怒的是,我被束缚在北京,而这里政府通常的作为仅限于对外边来的建议行使否决权,主动行动则完全不可能,而且,由于有这么多的衙门和官员(不象在外面的口岸只有一个衙门和一个头目,比如李鸿章在天津),在这里私人影响根本靠不住。”^[51]不过,赫德当然是一股不容任何人忽视和力量。另一次,他又写道“他 [德璀琳] 和李鸿章把一个谈判进行到了一定程度,这时候,太后提出了一个更苛刻、一个不可能满足的条件:他们现在想把这件事交到我手里,这样

一来,他们得了把谈判进行到这个程度的功劳,而我将承担最后失败的责任。不过,德璀琳认为如果我接手此事,我将能够使它顺利完成。”^[52]

在很大程度上,德璀琳和赫德的关系是更大的一套关系中的一个部分,这一套关系还涉及李鸿章和清政府的外交事务机构——总理衙门。种种迹象表明,李鸿章(由德璀琳协助)和赫德(有时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一直不断地争夺对清朝外交事务的控制^[53]。赫德认为李鸿章对他在朝廷的影响十分不满并想推出德璀琳来与他争斗,这也很可能是事实。但是,尽管两人之间的竞争和嫉妒是丝毫不假的,多年中赫德和德璀琳也维持了一种“友谊”,有时甚至还是密切的关系。正如上面引的赫德信中的两段话透露出来的,两人各有自己的优势,有时为了某种计划的成功有必要合二人之力。无疑德璀琳和赫德都有足够的眼光和气量,使他们能够在某些项目上进行合作。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大清邮政的建立。赫德是它的首倡者,但为了确保李鸿章的充分支持,他情愿让德璀琳来具体负责。两个人一起推动这一计划:德璀琳运用他对李鸿章的影响,赫德运用他对总理衙门的影响。德璀琳“以巨大的精力和效率”为建立起全国性的邮政服务工作了二十年,虽然这件事的功劳似乎更多地被归在赫德名下^[54]。

这里不可能将德璀琳在中国的所有活动一一列举。他精力过人而且永远都在筹划着一些新的冒险。他的不少活动都是外交事务方面的,比如1884年的中法谈判,1894年的中日谈判,等等,当然还包括他在烟台的首次登场。德璀琳在清帝国的内部发展方面或许介入得更多。除了建立起现代的邮政服务,他在铁路、电报、采矿、以及军事技术的引进和发展方面都十分活跃。

随着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李鸿章也丧失了许多权力,这之后德璀琳与张翼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并参与了开平煤矿的事务。^①1895年,张翼任命德璀琳为煤矿的管理人之一,1900年又任命他为全权总经理。此时新起的实力人物,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对张翼和德璀琳都不喜欢,他后来指控他们两人偷偷把煤矿出卖给了英国人。这件事最后在英国上了法庭,审判期间暴露出来德璀琳一直从张翼那儿拿钱,而这是违反海关规定的。审判结束后德璀琳于1908年回到中国,随即从海关辞了职。此后,德璀琳仍住在天津,但由于不再有象李鸿章那样的保护人,在他一生的最后5年中德璀琳只能满足于参与中国工程与采矿公司的业务,这对于一个一向热爱宏大的计划和“高级政治”,而且确实曾在其中荣耀了很久的人不能不说是个悲哀的结局。

5 结论

上述四人大概可以称之为十九世纪晚期中国的西方技术捐客(如果“捐客”有时包含贬义的话,那么“中间人”这个较为中性的词将更准确)。他们的经历有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似乎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成功地获得了捐客的地位。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四个人都把自己和有权势的地方官员而非北京的中央政权联系了起来,在这一点上

^① 张翼于1892年成为开平煤矿的总经理,1898年又被任命为直隶和热河两省所属煤矿的总负责人。关于开平煤矿的历史可参见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Kaiping Mines (1877-191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57.

他们与前辈的汤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① 等人明显不同。这些早年的耶稣会传教士都是通过获得朝廷中的职位以及皇帝的保护来谋求名望和影响的。在日意格、马格里、容闳以及德璀琳的时代,老路已经不通了。这时仍旧向中央政府谋求职位的人很少会得到积极的反应。1861年,驻天津的一名法国军官通过一位当地官员向清廷表示愿来效力,声称他可以帮助训练中国士兵,购买外国武器,并雇经验丰富的外国工人来为清朝制造军火。虽然总理衙门对这一提议表示了一定的兴趣,它最后的意见是此事需谨慎处理,马上给予批准是不明智的^[55]。这件事终究不了了之。再比如,一个美国人曾申请到北京去,用他在天文和数学方面的才能为清政府服务。接到这一申请的地方官员索性认为不值得把它转呈给朝廷。他仅在一份奏折中提及此事及他的上述决定,朝廷在批示中也表示赞成他的作法^[56]。1873年,德克碑曾主动提出愿替清政府向法国的公使和在北京的主教交涉,限制法国传教士的活动,但总理衙门没有给予他必要的支持。在私人书信中李鸿章曾批评朝廷在这件事上无所作为。他抱怨北京的官员太多了,比如管理总理衙门,有一两个得力的大臣就足够了,而实际上任命了10位大臣,结果没人敢于出头负责。李鸿章认为德克碑的计划流产就是由于总理衙门这种可悲的状态^[57]。虽然赫德能够在北京而又享有极大的影响力,但这是靠了海关这支独立而强大的力量作后盾,所以赫德并不是例外。况且,连赫德也抱怨北京衙门和官员太多,捆住了他的手脚。

找准投身的地方和选准赞助人对任何想介入洋务的人来说固然关键,它也仅是第一步。本文中四个人的经历说明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在不断的竞争中赢得和保持那些洋务领袖的好感。当年那些所谓的“中国的朋友们”之间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比如,福州海关的法国税务司美里登早在福州船厂项目之前就一直是日意格和德克碑的竞争对手,他与左宗棠建立联系不晚于1864年。美里登接连不断地向左宗棠献策。他先是愿意帮助招募外国军官来训练中国士兵,继而又建议左宗棠进口外国的机器来铸币,以便获取高于现行方法的利润,再以后他又提出为左宗棠联系外国贷款^[59]。显然,美里登和日意格一样,也把李泰国关于设法赢得中国官员感激的教导一直牢记在心。就连赫德总税务司也从未停止在清朝的洋务中争夺更大的份额,尽管他早已是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外籍雇员。除了他与德璀琳的长期竞争,赫德还曾试图夺走日意格和马格里手中的一份好处。他与日意格的竞争发生在后者替李鸿章做采购代理的时候。此时也在替李鸿章在英国买战舰的赫德自称能做成更合算的买卖,并指控日意格为了中饱私囊而使中国付出不必要的高价^[60]。不过,赫德对马格里发动的攻势才最能说明“中国的朋友们”彼此竞争的激烈程度。赫德提名了他的某个下属担任郭嵩焘的英文秘书,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支持马格里。即便在马格里已被正式任命后赫德仍不放弃战斗,而是继续设法削弱马格里的地位。下面就是赫德给他在伦敦的代理人金登干发出的关于马格里的各种指示和评论的例子:

“郭嵩焘很可能会发现他需要外国翻译,而在英国的一些讲中文的人……可能会设法抓住他。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并防止: 1. 他落入不良的手中; 2. 公使馆内滋生出一批来自海关之外的外国雇员。我因此授权你立刻召梯内姆和施乔斯或卡罗到伦敦

① 关于这两个人的一些情况可参见 Jonathan spence,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02-1960*.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派梯内姆到巴黎去迎候郭嵩焘,并陪着他直到他抵达伦敦的住所,然后把梯内姆留在你身边直到郭嵩焘在伦敦的生活入了轨道。这样一来你就能防止偶发事件或必要性迫使郭嵩焘去抓住外边的人,或者被外边的人抓住;但是,由于郭嵩焘可能会担心我们插手他的事务,所以不要太明显地把梯内姆塞给他,只要让梯内姆随时在你身边,让人有时候去看看郭嵩焘并用不太强加于人的方式为他做各种事情^[61]。

当心马格里。盯住他。别给他任何‘面子’。他是反对我们的——所有的人都这样跟我说^[62]。

设法让郭嵩焘感到梯内姆是必要的,让马格里成为不必要的;不过,要静悄悄地干,不要显出这是你的目的。”^[63]

当然,赫德自己也免不了成为类似的暗中破坏的对象。一次,他带着明显的恼怒告诉金登干,德璀琳建议李鸿章应采纳赫德提出的计划,但让别人去负责实施,而李鸿章似乎也很乐于听从这一建议。

竞争和冲突不仅限于外籍雇员之间。当时的西方作者都喜欢喋喋不休地抱怨外籍雇员在他们的中国同事那里受到的虐待。比如,有一则轶事说马格里在金陵制造局的时候,某次上边要来视察,视察期间将有水雷的演示。有个中国人因为嫉妒马格里的成功,割断了已被放置在河底的水雷与电池之间的连线,企图以此来破坏演示^[65]。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如上文提及的,马格里确实与他的中国同僚有严重的摩擦。容闳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先后与他共同担任留美学生监督的两位官员都不断向国内发回消极的报告,批评学生的状况和容闳的领导方式。

鉴于这种富于挑战性和激烈竞争的环境,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以本文中的四人为代表的一些竞争者脱颖而出成为胜利者的呢?最显而易见的因素包括他们的语言能力和外交才能。显然会说中文大大促进了日意格、马格里和德璀琳的上升,而英文知识帮助了容闳。至于外交一类的技巧的重要性,大约在美里登与日意格和德克碑争夺左宗棠好感的竞争中表现得最明显。上文已述及,尽管美里登急切地向左宗棠提供自己的服务,而且左宗棠也确实委托他办了一些事,包括购买一艘英国战船^[66],但他却从未象日意格和德克碑一样得到左宗棠的喜爱。它的原因可以在左宗棠写给总理衙门的一份奏折中找到。左宗棠在其中也承认美里登并非包藏祸心,他用无数的建议来打扰自己只不过是想要从中赢得些好处,但他不喜欢美里登这样肆无忌惮地插手各种超出海关税务司职权的事务^[67]。在左宗棠看来,日意格和德克碑那种不过分出头的态度使他们显得远较美里登可信赖。本文中的另几位成功者也都曾表现出这种技巧的处事态度——只要回想一下容闳是如何耐心地等待最佳时机来提出他的留学计划,而不是在曾国藩心有它属的时候急于推销它,以及他如何费尽心机地安排那四条建议的顺序。

本文中四人的生涯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在那些洋务领袖手下效力时都需要发挥多重作用,而不只是承担某个单一、明确的职责。以日意格和德克碑为例:他们先是左宗棠在蒸汽船和造船方面的老师和顾问,随后又成福州船厂的设计者。这之后他们担任了船厂的采购员和招聘者。船厂运转起来后他们负责日常管理,同时还充当中国官员和外籍雇员之间的联系人。马格里、容闳和德璀琳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中国的雇主们要依赖他们提供一整套的服务,这套服务通常是从作为老师向这些雇主讲解他们希望引进的西方技术开始。回想一下马格里如何通过富有戏剧性的演示向李鸿章证明他购买

的机器是有价值的。这则轶事生动地说明早期的洋务雇员在成为捐客、经理人等等之前或多或少都要先扮演教育者的角色。晚到 1886 年,英国怡和洋行的代理人还报告说李鸿章几乎完全要依靠德璀琳或想从他那里搞到订单的外国商业代理来向他“解释武器技术的复杂内容”^[68]。

与这些人在许多主要的洋务企业中承担的重要而广泛的责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们在专业训练和相关经验上的缺乏。日意格和德克碑在创建福州船厂之前从未造过船;马格里和军工厂发生联系前是名军医;机械显然不是容闳的行当,但他却被请来在这方面出点子和做决策;德璀琳在哪方面都不是专家,却哪方面的事都管;最后,汉纳根被派去统率一支舰队,虽然他只在陆军服过役。^①显然,缺乏经验或专长对这些人获得重要的任命没有构成任何障碍。

归根到底,这是一个信任的问题。清朝的朝廷和官员们衡量洋务候选人的首要标准是看他们是否可以信赖,专长、技能、经验等等都在其次。毕竟,任用非专业人员是与中国历史上在选拔官员时不考虑甚至轻视专业技能的传统相一致的,而把关键性的职位交付给“夷人专家”或中国的“夷务专家”则是前所未有的新尝试。不过,采取这种选人的标准主要还是基于清朝与这些人打交道的经验。清政府因为通过不可靠的外国代理人购买武器和战船而损失过大量金钱^[69],事实证明它的许多外籍雇员感兴趣的只是从中国人身上赚钱。一位曾在北洋舰队服过役的美国人阿灵顿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话可以使人对当时的情况窥见一斑:

“我永远不会忘记李鸿章第一次面试我的情景……他对我以往的生活询问得如此详细,以至于我的印象是他打算替我写传记。回顾我在中国人中间生活的多年经历,再想想那些形形色色的靠着中国政府的慷慨而养肥自己的冒险家,我现在充分理解李鸿章为何要详细询问我以前的情况,而不再感到奇怪了……[在获得任命之后]我赶快就去报到。他们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问我是否真想这么快就开始工作,而不是先休几个月的假来进行准备。我以为这是个诡计以便尽早赶走我,于是当然回答说需要休假。后来我才发现,根据中国人以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外国人一般都会要求先休几个月的假来“准备”自己,在这期间薪水则照拿不误。”^[70]

汉纳根违背合同,试图将普鲁士军队处理掉的枪卖给李鸿章的事件是可以说明当时外籍雇员一般行为的另一个例子。如果有些外国人似乎对钱不怎么关心的话,那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搞间谍活动更感兴趣^②。

许多中国的“夷务专家”也丝毫不比外国冒险家强。曾纪泽被任命为驻英公使后,一位

① 这种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既然洋务运动中四个最重要的军工企业及为它们的建立作出了贡献的人本文已涉及其三(福州船厂—日意格,金陵制造局—马格里,江南制造局—容闳),这里不妨也提一提第四个,即天津机器制造局。它是由密妥士(J. A. T. Meadows)帮助建立的。这位密妥士也不是军工方面的专家。他是英国人,但在参与建立天津制造局前的身份却是丹麦驻天津的领事。制造局的创办人崇厚聘他为制造局采购设备及招募外国专家,随后他成为第一任负责人。后来,李鸿章接手了天津制造局后将他解雇。李鸿章不信任密妥士,他曾说天津的大多数领事都是货真价实的,只有英国人密妥士过去在作商人的同时还兼任美国的领事,近来他又变成了荷兰和丹麦的领事,而他自己的商业经营也破了产。见《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55页。

② 例如,William Tyler说他参加北洋舰队的主要动机是想为英国海军写一份关于中国舰队的报告。见 William Tyler, Pulling Strings in China. London: Constable & Co Ltd. 1929, 37.

朋友向他推荐上海某通晓英文和法文的人,建议曾纪泽带此人一起出国。在回信中曾纪泽写道:“此种人多犯两病,曰贪得无厌,曰不听约束,是二者犹有术以控驭之。下焉者,则直恐其为汉奸耳。”^[71]同时代的其他人也曾得出类似的结论。著名学者,自强运动的倡导者冯桂芬的有关评论便是一例。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缺乏经验的日意格、德克碑、马格里、容闳、德璀琳和汉纳根被选中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他们所有过的经验使他们赢得了那些洋务领袖的信任,而在当时这远比专业知识重要。日意格、德克碑和马格里曾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清朝剿灭太平军;汉纳根在清朝一边与日本作战时差点儿送了命;德璀琳对李鸿章和中国忠实到被几任德国公使鄙视的程度;西方教育出来的容闳当众揍了一个西方人,又为救济中国的灾民向外国人募捐,证明他是个爱国者,不是“汉奸”。

不过,也应指出,日意格、马格里和容闳都是在洋务运动的早期(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被雇用的。尽管通过这种非专业人员来引进西方技术和获取关于外国的知识在当时是普遍的作法,后来的情况还是有了明显的变化。随着洋务运动不断扩展,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接触日益广泛,随着清朝的官员积累了办洋务的经验,他们也越来越注重寻求专业人员。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汉纳根需要签一个合同保证不参与武器交易,合同中还规定薪金的增加要以他学习中文为条件。^①这表明中国的官员们至少已开始对雇用“夷人专家”进行管理。值得注意的是汉纳根来中国之前先去学了两年的工程学,这就使他有可能向中方提供较高水平的服务。虽然比日意格、马格里和容闳晚了十年才得到重用的德璀琳仍不具备专业知识使他成为向李鸿章“解释武器技术的复杂内容”的适当人选,但凭借着在海关工作的多年经验,他应该有资格帮助李鸿章处理与西方国家和公司的商业和金融往来,而这毕竟是他作为李鸿章的顾问发挥作用的一个主要领域。

至此,我们已看到公关技巧,身兼数职的能力,对中国办事方法的领会,值得信赖的形象等个人条件直接决定着什么样的人能成为成功的掮客。还应指出的是,这些人的命运还会因为一些非他们本人所能控制的因素而受到影响。这些因素从某个中国官员的个人喜好直到中国和西方列强外交关系的演变都可能包括在内。例如,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的经历使左宗棠深为愤慨,以到他终生未雇一个英国人,尽管他愿意招纳来自其它西方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的雇员^[72]。左宗棠在奏折和书信中多次把英国和其它西方国家进行比较,并得出结论说英国人最擅欺骗和居心险恶^[73]。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即使有诚实而抱有善意的英国人到左宗棠那里去求职也未必能成功。

由于利用外籍雇员去和他们本国打交道往往最为便利,所以掮客们的命运还常常会随着中国对外国产品的偏好发生变化而起落。比如19世纪80年代初期,李鸿章变得对德国的舰船和武器越来越感兴趣,于是他决定不再让法国人日意格作采购代理^[74]。李鸿章起用德璀琳和汉纳根很可能也与这一兴趣的转移有关。

在19世纪的中国,“洋务”这个词兼指引进西方技术和处理外交关系这两种活动^②

① 合同中的条款似乎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这一点也应指出。

② 邓司遇(音)和费正清在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一书的引言中写到:“这两种活动也确实仅是一个单一问题的不同方面,即如何在现代世界中求得生存。”(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86)

清政府也的确没有将二者加以严格的区分。本文中举出的四个人就都是好例子——清朝既靠他们引进西方技术又曾倚重他们办过外交。不仅如此,这两者不分还表现在清朝选择外国雇员时常常要加进一些外交上的考虑,它把雇用某些外国人当作讨好、安抚或者争取他们国家支持的手段。由于西方列强一刻不停地在相互竞赛,有时是在向中国提出侵略要求方面,有时又是在表达“帮助”中国的愿望方面,各国都不肯落后,因此中国人发现哪扇门都不能关死。例如,19世纪80年代初期李鸿章在物色组建北洋舰队的人选时会邀请美国海军的萧孚尔准将(Shufeldt)来帮忙。一整年的时间里萧孚尔“如此频繁地前去访问李鸿章的船,以至于其它的外国人都相信他已经稳稳中彩了。”^[75]然而,李鸿章后来又变得躲躲闪闪了,萧孚尔也终于愤愤离去。同一时期赫德也曾得到暗示,舰队的管理权可能会交给他^[76]。此外,据萧孚尔的说法,德璀琳已攫取了一定的控制权;三个英国人,“皇家海军的‘半’军官,不过现在算是海关的人”,被作为“顾问”留在那儿;再加上两个“法国海军的前军官,被高薪聘用,却从未明确过是为什么目的的,凑成了三国。他们彼此嫉妒,都蔑视中国人,同时又努力想取得对它的海军的控制。”^①萧孚尔忘了提他自己,加上他就凑成了四国,这一切看起来就好像李鸿章要按一定的比例分配职位似的。

显然,中国方面的一些政治上的考虑会对外国求职者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这些人的运气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受到他们本国政策的影响。不仅中国利用外籍雇员来从他们本国引进技术并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外交事务,西方列强也把清朝雇用的本国公民当作推动它们在华利益的工具,因此,西方各国政府常常毫不犹豫地直拉替它们的公民向清政府和官员进言。比如,1871年,一位美国军官厄普顿上校提出愿帮助清政府建立一所中国的西点军校,美国的国务卿亲自出面表示支持他这一想法。不过,总的来说,可能德国政府才是在向中国推荐它自己的人,特别是军事教官方面,最积极的一个。李鸿章于1896年访问德国时,外交大臣马沙尔专门向他提出这一问题。他先是抱怨在中国工作的德国教官没有足够的权力,然后,仿佛是要表现德国也会利用国际竞争,他又对李鸿章说,比较而言和日本打交道就容易多了^[77]。最后,李鸿章同意聘请五十名德国军官来训练中国军队。

19世纪活跃在中国的西方技术捐客可以分成几类。那些雇于西方公司来推销其产品的构成了最纯粹的类型,因为他们大多仅有商业代理人这一种身份。本文中的四个人属于另一类型,他们首先是受雇于中国政府的洋务专家。因此,正如上文提过的,他们常常同时扮演几重角色。大多数情况下西方公司的商业代理不需要通过他们来与中国当局打交道。但是,由于这些人可以接触到重要的官员及内部情报,更不要说他们对洋务派领袖的影响力,那些商业代理们还是或多或少通过他们来办事。从这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在捐客们之中也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层次之分。

显然,对不同类型的捐客(中间人)成功也要求不同的条件。比如,向中国官员行贿对西方公司的商业代理来说可能是有效的手段,但日意格、马格里、容闳或德璀琳则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归根结底,这种捐客的成功甚至生存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同时照顾好三种不同的利益,即中国的利益,他们本国的利益(对于象容闳这样的中国

① 摘自萧孚尔 1882年1月1日写于天津的信。此信见 Paul H. Clyde comp.,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Diplomacy and Public Documents, 1839-1939*.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40, 163

人来说则是与他们有联系的外国的利益),以及他们自身的利益。^①这四个人都曾努力想创造的理想状况是中国人对他们的工作十分满意并完全信任他们;西方国家同样感到满意并全力支持他们;最后,等到双方都赏识他们时,他们自己的利益自然也能得到满足。这四个人都在平衡这三种利益上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因此他们从中国和西方国家那里得到了足够的认可,使他们作为中西文化之间的沟通者享有过多年的成功生涯。马格里的例子或许最能说明问题。他被任命为郭嵩焘的英文秘书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英国公使威妥玛。威妥玛对马格里很满意,因为他发现尽管在中国人中生活了多年,“马格里医生仍然是个英国人”^[78]。另一方面,英国政府最后授予马格里爵士头衔又是应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之请,他认为马格里是中国忠实而宝贵的帮手。

马格里也有过不那么愉快的事情,比如李鸿章指控他向中国工人隐瞒技术的时候,或者当很多英国同胞猛烈攻击他“向中国讨好”,称他“内心里是个中国人”的时候^[79]。不过,这种不快和日意格的遭遇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很多中国官员,包括李鸿章,都指责日意格在福州使用旧的机器,造出的也是过时的船。他的国人也不断给他制造麻烦;在福州船厂开工前阻碍他的工作,后来又削弱他在船厂的权威。1874年中日琉球争端期间日意格因为随清朝军队去了台湾而受到法国政府的骚扰,在中法战争期间法国政府又秘密监视他的活动,而这却是个曾尽过最大的努力来照顾法国和中国利益的人。举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是中日在台湾的对峙发展到战事一触即发的关头,日意格看到对他卷入此事十分恼怒的法国驻华公使不可能帮助中国,便立即与英国公使联系,以便中国能从英国获得铁甲战船来对付日本^[80]。第二个例子是,在为建立中国的第一个现代机器船厂而努力工作的多年中,日意格也一直向法国海军当局定期报告船厂的所有进展和计划。这些情报在1884年帮助法国海军进攻并彻底摧毁了福州船厂^[81]。很显然,尽管日意格作了种种努力,他保持双重效忠的尝试只会招致双方政府的怀疑。这样的经历本文中的另几个人也都不能幸免。在19世纪晚期的中国这一历史环境中,当西方国家正在中国不断推进帝国主义政策之时,任何人,无论他有多高超的技巧,都无法在那几种持续冲突的利益之间维持真正的平衡。因此,那些试图同时为两个国家效力的人,其命运只可能是这样的:双方都会利用他们,但没有一方会真正信任他们。

参 考 文 献

- 1 Steven A. Leibo. Transferring Technology to Chian Prosper Giquel and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Berkeley,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5, 17
- 2 Steven A. Leibo. Transferring Technology to China, 44
- 3 杨书霖。左文襄公(宗棠)全集。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卷十五,25;卷七,14
- 4 美里登的报告见郭鼎仪(音)等。海防档。福州船厂。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58,卷一,64-69
- 5 郭鼎仪(音)等。海防档。福州船厂。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58,卷一,394;杨书霖。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卷二十,64-68

^① 有时候还需要考虑第四种利益,即他们本国之外的其它西方国家的利益。上文已提到德琳琳愿意容纳英国的利益,日意格则提供了另一个好例子。为避免英国和德国的嫉妒可能带来的麻烦,他在福州船厂的学堂中除法文外还开设了英文,又聘请了英国的海军教员。他还考虑让德国人负责印刷船厂使用的钞票。国际竞争是很有可能带来大麻烦的,比如,上文提及的雇用五十名德国军官的计划终因俄国的强烈抗议而被取消了。见

- 6 Steven A. Leibo. Transferring Technology to China, 90
- 7 Prosper Giquel. The Foochow Arsenal and its Results from the commencement in 1867, to the end of the Foreign Directorate, on the 16th February, 1874. Shanghai; Shanghai Evening Courier, 1874, 35-37
- 8 Demetrus C. Boulger.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K. C. M. G. London John Lane, 1908, 60
- 9 Demetrus C. Boulger.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K. C. M. G. London John Lane, 1908, 70
- 10 Demetrus C. Boulger.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K. C. M. G. London John Lane, 1908, 79
- 11 Demetrus C. Boulger.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K. C. M. G. London John Lane, 1908, 131
- 12 Demetrus C. Boulger.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K. C. M. G. London John Lane, 1908, 198
- 13 North-china Herald. November 3, 1866. 《北华捷报》1866年 11月 3日)
- 14 Demetrus C. Boulger.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K. C. M. G. London John Lane, 1908, 222
- 15 Wing Yu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41
- 16 Wing Yu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59
- 17 Wing Yu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74
- 18 Wing Yu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72
- 19 Wing Yu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75
- 20 Henry N. Shore. The Flight of the Lapwing: A Naval officer's Jottings in China, Formosa and Japan.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81, appendix IX, 533-534
- 21 Wing Yu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149, 151
- 22 Wing Yu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175
- 23 Wing Yu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192
- 24 吴汝伦。李文忠公(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0, 卷二, 51; 吴汝伦。李文忠公(鸿章)朋僚函稿。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7, 卷十九, 1262-1263
- 25 吴汝伦。李文忠公(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0, 卷十二, 7; 吴汝伦。李文忠公(鸿章)朋僚函稿。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7, 卷十九, 1453
- 26 Wing Yu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227
- 27 Vera Schmidt. Aufgabe und Einfluß der europäischen Berater in China. Gustav Detring(1842-1913) im Dienste Li Hung-chang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4, 6
- 28 Vera Schmidt. Aufgabe und Einfluß der europäischen Berater in Chin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4, 18
- 29 W. A. 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 Edinburgh and London: Anderson and Ferrier, 1896, 416
- 30 Vera Schmidt. Aufgabe und Einfluß der europäischen Berater in Chin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4, 8
- 31 Kenneth E. Folsom. Friends, Guests, and Colleagues: 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153
- 32 Paul King. In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A Personal Record of Forty-Seven Years. New York: reprint, 1980, 88
- 33 Paul King. In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A Personal Record of Forty-Seven Years. New York: reprint, 1980, 192
- 34 William F. Tyler. Pulling Strings in China. London: Constable & Co Ltd., 1929, 43, footnote 1
- 35 Stanley F.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Belfast: W. M. Mullan & Son Ltd., 1950, 511
- 36 Paul King. In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A personal Record of forty-Seven Years. New York: reprint, 1980, 72
- 37 John K. Fairbank et al ed., The I. G. 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Customs 1868-190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tter 358, 405
- 38 John K. Fairbank et al ed., The I. G. in Pek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tter 421, 470
- 39 John K. Fairbank et al ed., The I. G. in Pek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tter 427, 477

- 40 Vera Schmidt. Aufgabe und Einfluß der europäischen Berater in Chin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4, 22
- 41 Paul King. In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A personal Record of forty-Seven Years. New York; reprint, 1980, 72
- 42 Edward Le Fevour. West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A Selective Survey of Jardine, Matheson and Company's Operations, 1842-1895. Massachusett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68, 70
- 43 Vera Schmidt. Aufgabe und Einfluß der europäischen Berater in Chin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4, 83
- 44 Vera Schmidt. Aufgabe und Einfluß der europäischen Berater in Chin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4, 155, footnote 482
- 45 Vera Schmidt. Aufgabe und Einfluß der europäischen Berater in Chin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4, 83, 84
- 46 Vera Schmidt. Aufgabe und Einfluß der europäischen Berater in Chin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4, 36-37
- 47 Vera Schmidt. Aufgabe und Einfluß der europäischen Berater in Chin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4, 39
- 48 John K. Fairbank et al ed., The I. G. in Pek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tter 342, 389; letter 493, 563. See also letters 346, 466, 483, 383, 565, 1056, etc.
- 49 John K. Fairbank et al ed., The I. G. in Pek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tter 389, 434; letter 493, 563, etc.
- 50 John K. Fairbank et al ed., The I. G. in Pek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tter 427, 477-478
- 51 John K. Fairbank et al ed., The I. G. in Pek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tter 484, 552-553
- 52 John K. Fairbank et al ed., The I. G. in Pek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tter 565, 631
- 53 Stanley F.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Belfast: W.M. Mullan & Son Ltd., 1950, 534, 536-537; Hosea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Taipei: reprint, 1987, vol. 2, 370-371; Vera Schmidt, Aufgabe und Einfluß der europäischen Berater in Chin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4, 5
- 54 Hosea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Taipei: reprint, 1987, 62-65; Vera Schmidt, Aufgabe und Einfluß der europäischen Berater in Chin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4, 24-25
- 55 郭鼎仪(音)等。海防档。购买船炮。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58, 卷一, 3-6
- 56 Kenneth W. Rea ed. Earl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841-1912: The Collected Articles of Earl Swish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77, 34-35
- 57 吴汝伦。李文忠公(鸿章)朋僚函稿。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7, 卷十三, 13
- 58 John K. Fairbank et al ed., The I. G. in Pek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tter 342, 489
- 59 杨书霖。左文襄公(宗棠)全集。书牋。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9, 卷七, 14-17, 20-22, 26, 27, 40, 43
- 60 John K. Fairbank et al ed., The I. G. in Pek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tter 184, 251
- 61 John K. Fairbank et al ed., The I. G. in Pek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tter 157, 227
- 62 John K. Fairbank et al ed., The I. G. in Pek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tter 165, 234
- 63 John K. Fairbank et al ed., The I. G. in Pek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tter 166, 235
- 64 John K. Fairbank et al ed., The I. G. in Pek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tter 428, 479; letter 466, 527
- 65 Robert K. Douglas. Li Hungchang. New York: Frederick Warne & Co., 1895, 171
- 66 杨书霖。左文襄公(宗棠)全集。书牋。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9, 卷八, 45
- 67 杨书霖。左文襄公(宗棠)全集。书牋。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9, 卷七, 43
- 68 Edward Le Fevour. West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

CHINA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18 No. 3(1997)

CONTENTS

SUMMARIZATION

Brokers of Western Technology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Lu Yiyi(3)

PERSONALITIES

Bo Jue and His Telescope Wang Shiping, Liu Hengliang, Li Zhijun(26)

The Founder of Radichemistry in China— Dr. Tcheng Datchang Guo Baozhang(32)

The Life and Achievement of the Famous Chinese Physicist Lu Hoff Wu Shuiqing(36)

Shen Yijia and His New Method of Steelmaking Zhao Qingzhi(31)

COMMUNITIES' ORGANIZATIONS

A Chronological Table of officials Serving in Qing Dynasty's Imperial Board of Astronomy and Section of
Almanac Qu Chunhai(45)

MATERIALS AND TEXTUAL RESEARCH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Years of Some Han *Wooden Slips Excavated at Ju-Yan* Luo Jianjin(72)

A Japanese Transcript of *Jing Tian Gai* Shi Yunli(84)

The Storg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ian gong Kai wu* by Li Ximou and Li Qiaoping Zhao Qingzhi(90)

A Summary Account of the Symposium on Life Sciences and Biotechnology for Overseas and Returned Chenes e
Bio-scientists Cao Yu(95)

The Responsible Editor Qu Baokun

Specially Invited Professor Editor for English Li Tiansheng